



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 
主编 陈漱渝

# 评说郭沫若

房向东 编

上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评说郭沫若/房向东编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1.5

(中国当代文化现象)

ISBN 7-80094-984-2

I. 评…

II. 房…

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

②郭沫若(1892—1978)—文学评论。

IV. I 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2607 号

## 评说郭沫若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1 字数 359 千字

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94-984-2/I·514

定 价:89.80 元(上中下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# 前 言

房向东

在中国历史上，像郭沫若这样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的人应是不多的。他在中国现代文学、文化、历史、考古、思想、政治史诸方面，都留下了清晰的痕迹，可以说是一个奇特的存在。

郭沫若是时代的宠儿。

恩格斯在论述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时说：“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、进步的变革，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——在思维能力、热情和性格方面，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。……那时，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，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。……他们

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有处在时代运动中，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，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，一些人用舌和笔，一些人用剑，一些人则两者并用。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。”（恩格斯《自然辩证法·导言》，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—8页）人们早已把中国的“五四”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，也早已把“五四”时代的先驱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相并论。郭沫若是伟大的“五四”运动所产生的一个新人，他是五四时代的宠儿。他在思维能力、热情和性格方面，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出类拔萃，而且也是舌笔和剑并用。

沈从文说，郭沫若既在“翻译与创作，在创作中与诗、与戏剧、与散文、与小说，几乎皆玩一角，而且还玩得不坏。”（沈从文《论郭沫若》，原载李霖编《郭沫若评传》，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初版）沈从文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郭沫若首先举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；最早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；是在20世纪

20年代发生很大影响的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的重要发起人和组织者；在新诗、历史剧、小说、散文、传记文学等文学领域，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。他的新诗开一代诗风，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；他的历史剧别开生面，为现代史剧创作开拓了广阔的道路；他的自叙传作品是形象的历史，从一个侧面描绘了民主革命时代的风云变幻。郭沫若“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，包括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历史、考古学、金文、甲骨文研究，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，都有重要建树。”（邓小平《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》，原载1978年6月19日《人民日报》）能够在现代史土作出如此突出的贡献，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，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。因此，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巨人。

可是，郭沫若的业绩还不只是这些“立言”之举，他还是“立功”之人，是“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。”（周恩来《我要说的话》，原载1941年11月16日《新华日报》）1926年，郭

沫若就参加了北伐战争，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前夕，写了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，产生重大政治影响。同年参加南昌起义。抗日战争爆发后秘密回国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……在这样的一篇文章里，郭沫若的革命业绩我们难以一一例举。

夏衍说：“自古以来，讲究人要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这些方面郭老都有不可磨灭的成就。立言，他的著作等身嘛！立功，不管是在新文化运动中，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他都立了很大的功，这是有目共睹的；立德，这就涉及为人的问题了，是不是有缺点呢？当然会有一点，但这终究是他伟大一生的次要方面。”（《实事求是地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——郭沫若》，原载《郭沫若研究·学术座谈会专辑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）是的，正是在“立德”方面，一些人对郭沫若多有非议。

我们来看看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的郭沫若。

一切以时间和环境为条件。女英雄张志新在

“文革”的黑云压顶之际，痛骂逆贼，为捍卫真理献出了美丽的生命，其人格堪称崇高。可是，倘有人把张志新曾经义正辞严表述过的话，在今天又痛快淋漓地重复一遍，我深信，他无论如何不会成为张志新第二的。武松打虎是英雄，要是谁拿了哨棒到动物园里打虎，那只能是小丑，弄不好还要蹲监狱的。

自然，现在不会有人像张志新那样，诅咒那可诅咒的年代了，因为那一页翻了过去，成了历史。目下有谁再在那里写文章骂“四人帮”，绝对出不了名，倒是为“四人帮”之流写写翻案文章——比如说，《龙江颂》也是艺术精品，王力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，等等——有可能语惊四座，一夜登龙。现在时髦的是骂鲁迅和郭沫若这一类人。鲁迅就不说了。骂郭沫若，则是若干年来经常的话题，且郭沫若已经闭嘴，至少在我看来，骂的人多，而少有人出来反驳。因而，郭沫若似乎成了一个人格卑下的无耻文人了！我读了若干这类文章，归纳起来，无非是郭沫若焚书一事；郭沫若投毛泽东所好写《李白与杜甫》一



事；郭沫若治学不严谨，时有错谬甚至有抄袭之劣行等等。自然，郭沫若在这些事情上，有的也不是无可非议。可是，一些骂郭沫若的人，若是在当年勇敢指陈，那我是会诚心诚意地佩服的。问题是，这些名人和非名人当年他们也早请示，晚汇报……到了今天，却跳出来争当事后诸葛亮。他们为什么不去自我忏悔，却还要骂郭沫若呢？骂郭是手段，其目的是通过骂郭而美化自己的人格，巧妙地让自己崇高。他们知不知道“文化大革命”特殊的时代背景呢？一清二楚。他才不管背景不背景，只要有好处，先骂再说。郭沫若是一个巨大的存在，我连郭沫若都敢骂，可见我是够有勇气的吧，是够正直的吧，是够崇高的吧！——话说透了，就这么回事。

对郭沫若的“劣行”进行逐条分析以后，我发现，郭沫若并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样，是个逢场作戏的人，并不那么丑陋。相反，抨击郭沫若的，我来看去看去，也委实看不出有什么崇高——倘若一定要说有，那也只是假装的崇高。

先说郭沫若焚书。提出要焚烧自己的著作

的，最早其实并不是郭沫若，而是巴金。由于巴金的地位与郭沫若不同，所以在全国并没有产生那么大的影响。1965年底，巴金在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的学习会上，“主动地检查了1962年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的错误。我还说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。”巴金说了自己这样做的目的，“这样讲过之后比较安心了，以为自己承认了错误，或者可以‘过关’。”（《真话集·三论讲真话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月版）很显然，巴金是出于自保才不得已说了一些违心的话，是为了“过关”。

1966年4月14日，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”的报告后，即席发言，表示要“烧掉”自己的一切著作。他说：

石西民同志的报告，对我来说，是有切身的感受，说沉痛一点，是有切肤之痛。因为，在一般人看来，我是一个作家，还是一个诗人，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。几十年来，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，也翻译了些东西，按字数来讲，恐怕有

几百万字了，但是，拿今天的标准来讲，我以前所写的东西，严格地说，应该全部把它烧掉，没有一点价值。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，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，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很模糊。

郭沫若所处的地位与巴金是大不一样的。他的讲话很快被康生送毛泽东批阅后，交由《光明日报》发表，4月28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时题作：《向工农兵群众学习，为工农兵群众服务》，又转载于5月5日《人民日报》。

郭沫若要把自己过去写的书全部烧掉的事，不仅国内各界人士知道了，连国际上的许多人也知道了，莫不为之惊讶。有的人甚至议论说，郭沫若是否马上要垮台，或者已经垮台了？其实，郭沫若所说的“烧掉”一词，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。5月，他在前海西街18号自己的寓所接待松村谦三、黑田寿男、宫崎世民等外宾时，向来访者解释说，“烧掉”就是“自焚”、“涅槃和再生”的意思。会见中，郭沫若指着自己的著作风趣地说：“你们看，书不是通通都还在吗？”他还

反复向客人解释，“把书通通烧掉”不是真的要“烧书”，意思是“要像凤凰涅槃（下加木）那样，在自焚后从火中再生。”

郭沫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，将“烧书”表述为“凤凰涅槃”。我们若是结合1920年他写的《凤凰涅槃》加以考察，似乎会有所启发。在题记中，郭沫若写道：“天方国古有神鸟名‘菲尼克司（phenix）’，满五百岁后，集香木自焚，复从死灰中更生，鲜美异常，不再死。”郭沫若在“文革”背景下的焚书，自然没有“凤凰涅槃”那样壮美，但主观上郭沫若肯定是有所联想的，包含有一种对早年诗作意念的回想，包含有一种自我否认的真诚，包含有一种由郭沫若本性难移的固有的诗人气质所派生的冲动，此其一。其二，“文革”是“触及灵魂的运动”，对最高指示——“破四旧”——“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”。当年，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，下到普通百姓，不是都要过关、表态，甚而至于，周总理也要举着“红宝书”吗？郭沫若采取一些“紧跟”的步骤，采取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，有

什么可以苛责的？我的一位老同事说，“文革”中，他将民国的邮票都付之一炬，而且还是半夜三更悄悄地干的。今天想来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可当年，怕呀！郭沫若也是人，我们若是持平常心，将其和我的那个老同事一样看待，对郭沫若的焚书，其态度是否会平和一些呢？其三，应该说，由于郭沫若的非同凡响，他的焚书，客观上对当年的“破四旧”、“焚书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但是，这是被康生等人利用造成的。不可想象，若是郭沫若不焚书，“文革”当中就不“破四旧”了、不到处焚书了。我们只责怪郭沫若是不公平的。

再说投毛泽东之所好。毛泽东是党的领袖，有不少人投毛泽东之所好，但都没有郭沫若这样的大名声，他本身也是过客，就没有人去计较了。这是首先必须指出的。

郭沫若与毛泽东，不似一般人与毛泽东，他们是有过长久往来的。1926年，毛泽东在广州办农讲所，就请郭沫若前去讲课。毛泽东称郭为“兄”。1945年重庆谈判时，郭沫若见毛泽东带

的是旧怀表，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了毛泽东。建国后，毛泽东与郭沫若诗词唱和，在毛泽东不多的诗词中就有两首是和郭沫若的。毛泽东常常半夜到郭的住处，与郭谈诗。出于对党的领袖的尊重，出于他们固有的友谊，出于他们都是浪漫主义诗人，郭沫若附和毛泽东，为毛泽东的文艺观点做一些拓展、补充、使之具体化的工作，这应是不足为怪的。我印象中，郭沫若是这样一种人：你对我不好，则罢了；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更好。毛泽东投之以木桃，郭沫若报之以琼瑶。同是诗人，意气相投，何足深究？遥想当年，鲁迅对郭沫若小有微词，郭沫若也不依不饶，予以反击。而当鲁迅说郭沫若大方向是与其一致的，郭沫若便接连不断发表文章，情绪激动，尊鲁迅为大师，为旗手。蒋介石叛变革命，郭沫若第一个喊出“打倒蒋介石”的口号。抗日救亡，郭沫若别妇抛雏，秘密回国。蒋介石有所借重，亲自召见，从抗战时局，到甲骨金文研究，关怀备至，大约半是真心半是假意？很快，郭沫若写了《蒋委员长会见记》一文，甚而至

于，在文章中高呼“蒋委员长万岁”。郭沫若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好冲动的性格，诗人的气质。我以为，他是单纯的，无论如何说不上投机。

再说，若讲毛泽东最喜欢的诗人，是李贺而不是李白。郭沫若倘若只是投毛泽东所好，他写的应是《李贺与杜甫》，而不是《李白与杜甫》。此外，扬李抑杜，对郭沫若本人而言，是由来已久的。在《我的童年》中，他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：

关于读诗上有点奇怪的现象，比较易懂的《千家诗》给予我的铭感很浅，反而是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。唐诗中我喜欢王维、孟浩然，喜欢李白、柳宗元，而不喜欢杜甫，更有点痛恨韩退之。（《郭沫若全集·文学篇》第11卷41页）

毛泽东喜欢李白，郭沫若也喜欢李白，这本来可以作为他们友谊的证明，但现在在某些人眼里，却成了郭沫若卑劣的证明。难道毛泽东喜欢李白，郭沫若就只能喜欢杜甫，这才是有气节

的表现吗？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：“莫非……一个讲革命，一个即该讲保皇，一个学地理，一个就得学天文么？”（《三闲集·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》）一样的，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搞阶级斗争，郭沫若就一定要搞阶级调和。

这里，要补充的是，郭沫若还有过“顶峰”论。他在《红旗跃过汀江》一文中说：“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书家，但他的诗书却成了诗书的顶峰。……每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。”对此，王元化评论道：“这话又说得何其肉麻！”今天，我以平常心观之，一想到当时的时代背景，实在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肉麻之处。且不说毛泽东的诗词、书法着实是好，“顶峰”论，在当年不是全国都在高喊吗？我想，攻击郭沫若的这些人该不会没有读过林彪的《再版前言》吧？该不会一次也没有做过早请示、晚汇报吧？该不会在“文革”中没有发过任何违心的言论、留下任何违心的文字吧！

最后说一说郭沫若的治学态度和抄袭问题。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文章很多，我这里要例举的是



姚雪垠的《评〈甲申三百年祭〉》。他认为郭沫若的这部著作“是作者在匆忙中赶写成的，不是严肃的历史科学著作”，还举例“对于李岩的死评价得更为不实事求是”，认为郭沫若“为后来史学界出现的所谓‘以论带史’，或‘以论代史’开了风气……”（《文汇月刊》1981年第1—3期）

大家知道，《甲申三百年祭》指出李自成由胜转败的原因，在其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。毛泽东在《学习与时局》的讲话中说：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，都是吃了亏的。……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，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，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。”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又说：“你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，小胜即骄傲，大胜更骄傲，一次又一次吃亏，如何避免此种毛病，实在值得注意。”

无论如何，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著作，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及地位是确定无疑